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22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 ——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周全, 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 合肥 230026)

摘要: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 年(CGSS2013)的数据, 使用 Ordered Probit 回归建立模型, 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 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 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 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 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关键词: 媒介使用; 环境治理;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绩效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D6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7)01-0162-07

近年来, 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以年均 29% 的速度递增^[1]。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模式中,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方^[2], 这意味着公众通常会将环境问题的改善程度与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是否到位画上等号^[3]。中央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强调环境治理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 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环境污染并非短期内形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环境治理都是中国公众所重点关注的政府公共服务。

在现代社会, 个人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知主要被传播媒介所塑造。媒介使用被认为能够对个体的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4]。在环境治理研究领域, 媒介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关注。国内相关研究过于关注新媒介对于环境治理所带来的挑战, 特别是基于新媒介平台的非制度化环境运动(或称为环境群体事件或环境热点事件)的组织与动员过程, 传统媒介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则基本处于被忽视状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风险正日益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关注, 茂名 PX 事件、《穹顶之下》所引发的空气污染问题等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都是公众有意识有组织地表达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环境治理强烈诉求的典型事件。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下, 环境治理工作的成败已经成为了关系到人民福祉、社会政治稳定和公众政府认同的重要政治问题^[5]。

国内仅有非常有限的文章针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简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张凤凉和郑方辉根据调查数据分析了广东省居民对于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水平, 限于描述性统计分析, 没有进一步使用统计模型探索可能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6]。宋国君等人的研究构建了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二级维度在内的政府环境保护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 并根据调查数据初步分析了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该调查仅在单一城市开展, 调查过程没有遵循科学随机抽样,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7]。孙玉红和何勃夫在文章中提出了环境保护工作公众满意度的测度模型, 但没有进一步开展实证检验^[8]。袁文华的文章定性地讨论了可能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9]。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测度以及以人口统计学特征为代表的内

收稿日期: 2016-06-14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重点研究项目资助(GH11046)

作者简介: 周全(1985—), 男, 博士研究生, E-mail: zqy@mail.ustc.edu.cn; 汤书昆(1960—),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mail: sktang@ustc.edu.cn

在因素对公众绩效满意的制约,忽视以传播媒介为代表的外在因素的影响。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传播媒介是了解环境问题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研究表明,传播媒介能够通过报道框架凸显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促使公众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工作^[10-11],传播媒介所提供的环境信息为公众对环境治理工作的成效进行判断和评估提供了基本依据^[12-13]。

学界对于传统媒介^①使用与政府认同间的关系莫衷一是,经验研究的结论同时支持着截然相反的理论假设。媒介抑制论(Media Malaise Theory)者认为,传统媒介有关官员渎职、贪污受贿等政治丑闻的报道会对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产生抑制效应;媒介使用会导致公众对于政治人物和政府的不信任、助长政治犬儒主义、降低个人的政治效能感^[14-15],公众在接触这类信息后会选择远离政治议题,这一过程还会进一步导致个体社会资本的下降^[16]。另有学者则指出,媒介使用能够对公众的公共议题认知、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产生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的促进作用^[17-18],这一理论通常被称为媒介动员论(Media Mobilisation Theory)。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传统媒介使用对于政府认同的“抑制”抑或“动员”效应并非泾渭分明,其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实际接触的信息内容;政治性新闻接触有助于提升政府认同,娱乐与商业内容接触则会造成政府认同的下降^[19]。

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兴起对政治传播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乐观者有之^[20],谨慎怀疑者亦有之^[21]。传统媒介有关政治传播媒介效果的争论在新媒介平台上继续上演,经验研究的结论同样为辩论双方都提供了实证支持。一部分研究发现新媒介使用有助于提升政治知识水平、促进公民参与、增强政治信任、提升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认同感与满意度^[22-23]。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新媒介平台上曾经活跃于传统媒介的内容“把关人(Gatekeeper)”不复存在^[24-25],反对的声音与批判性思想不会轻易被控制和过滤,在新媒介上能够接触到更为多元化的信息,新媒介使用对政府认同会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26-28]。

学界关于媒介使用与公众政府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领域。政治信任的形成受到公众对于包括经济、教育、就业、治安、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在内的政府绩效的综合评价的影响^[29],二者并非简单的抽象与一般的关系,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于媒介使用与具体治理领域的政府绩效满意度之间需要使用可靠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

研究问题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的影响是怎样的?传统媒介与新媒介是否分别发挥了“动员”与“抑制”效应?

研究问题2:如果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使用都能够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二者的影响效力间是否会存在显著性差异?

二、研究方法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项目。CGSS2013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单位。该抽样方案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城市以及随机抽选出的100个县级单位作为基本抽样单元。从5个城市随机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县级单位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村委会,共得到480个二级抽样单元,每个二级抽样单元随机抽取25户家庭,在每户中,采用Kish表随机抽取7人进行访问。设计样本量为5个城市2000,100个县级单位10000,共计12000,实际完成有效样本量为11438。

因变量为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满意度,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您认为5年来,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您认为近5年来,您所在地区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1=片面注意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2=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3=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4=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5=取得了很大成绩^①。

自变量为公众的媒介使用,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备选项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等6项。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

^①传播学研究中通常根据媒介特性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归类为“传统媒介”,将互联网和手机归类为“新媒介”,并分别研究它们的政治传播效果。

^②选项中还包括:-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适用,选择这些选项的样本量不到总样本量的1%,被编码为缺失值,下同。

常;5=非常频繁。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兴起之后,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称为“传统媒介”。这一划分标准得到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的支持($KMO=0.681$, Bartlett 检验 $p<0.001$),6种媒介使用共提取2个公因子,分别是传统媒介因子和新媒介因子,前者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4类媒介,旋转后因子负载分别为0.815、0.719、0.639和0.491,该因子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40.8%;后者包括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旋转后因子负载分别为0.813和0.764,该因子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19.8%,两个公因子共解释了60.8%的方差。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4类媒介使用频率的加总均值作为总的传统媒介使用变量,取值范围是1~5,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2类媒介使用频率的加总均值作为总的新媒介使用变量,取值范围是1~5。

除因变量和自变量外,5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首先,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通常会选取的基本控制变量;除此之外,为了控制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还加入了居住地和居住地区两个变量。其次,在公共管理与政治传播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将政治身份和社会价值观等可能影响个体政治态度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30-31]。最后,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所拥有的环境知识为公众对环境治理工作进行评估提供了判断依据^{[12][847-863][13]641-656},因此,将环境知识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控制变量的具体编码方式如下:

人口统计学。性别:1=男性,0=女性。年龄:使用2013减去出生年份计算得出。年龄平方/100:将年龄平方纳入是为了考察因变量是否与年龄存在非线性的“U形”关系。教育年限:0=没有受过任何教育,6=小学或私塾,9=初中,12=高中及中专,15=大专,16=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个人年收入:单位为千元。主观社会地位感知:对应的问题为:“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1=较低;2=差不多;3=较高。居住地:1=城镇,0=农村。地区划分:根据中国三大经济带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需要对地区划分进行了重新编码,1=东部地区,0=中西部地区^①。

政治身份与社会价值观。政治身份:是否是共产党员,1=共产党员,0=非共产党员。社会价值观。使用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感作为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指标。社会信任:“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说不上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社会公平感:“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1=非常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说不上公平不公平;4=比较公平;5=非常公平。

环境知识。使用一个包含10个题目的量表对受访者进行评估:(1)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5)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6)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7)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8)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9)水体污染报告中,V类水质意味着要比I类水质好;(10)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其中1、3、5、7、9项是错误的表述,2、4、6、8、10项是正确的表述。被访者选择该表述是正确、错误或者不知道,在此基础上重新编码,1=实际判断正确,0=实际判断错误或者不知道。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826$),可以看做单一维度的量表进行累加,因此我们将各项值进行加总,得到环境知识水平变量,取值范围是0~10。

三、研究结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均采用单维度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对于此类有序分类变量,研究者通常会同时使用OLS回归和广义线性模型(如Ordered Probit回归)建模以检验回归效应的稳健性。研究时分别使用OLS回归和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了模型,结果表明,两个回归模型的结果在所有研究变量上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健性: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变化非常小,回归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改变。为节省篇幅,只列出Ordered Probit回归的结果。

①中西部间在回归分析中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作者为简化模型而将它们合并。

控制变量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是关注的研究问题,因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省略了这部分信息。模型1和模型3(如表1所示)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以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为划分分别考察媒介使用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1可以看出,传统媒介使用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呈轻微显著的正相关($B=0.031, p<0.1$);新媒体使用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B=-0.082, p<0.001$)。与此类似,模型3显示,传统媒介使用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B=0.05, p<0.01$);新媒体使用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呈显著的负相关($B=-0.041, p<0.01$)。模型1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传统媒介使用和新媒体使用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分别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动员”效应)和负向效应(“抑制”效应)。表2中Wald Test检验的结果表明,传统媒介的“动员”效应和新媒介的“抑制”效应在地方政府层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然而,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的“抑制”效应则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的“动员”效应($F=5.323, p<0.05$),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体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的高于传统媒介使用。

模型2和模型4(如表1所示)进一步分析了具体类型的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传统媒介中,电视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0.034, p<0.01$)。新媒体中,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均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分别是非常显著的负相关($B=-0.055, p<0.001$)和比较显著的负相关($B=-0.025, p<0.05$)。模型4的结果显示,与对中央政府的影响不同,电视与手机媒介使用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并没有显著性相关,互联网的影响则比较稳健,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B=-0.031, p<0.01$)。

四、讨论与结论

传统媒介使用能够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现阶段,中国传统媒介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仍遵循政府主导模式^[32],相关报道主要是以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解读和治理成果展示为代表的“政策叙事”^[33],这意味着传统媒介使用能够提升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了解程度,从而有助于促使其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做出较高的评价。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政府主导的传统媒介在议题构建上的失衡以及“公众本位”的缺失会弱化媒介对于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并导致公众转向更为开放的新媒介平台进行环境问题沟通^[34]。

从具体类型的媒介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层面,传统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电视媒介上。通过电视媒介的政治性新闻接触能够显著的提升个体的政府认同感^[35]。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媒介是公众获取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地方政府层面,4类具体类型的传统媒介使用具有正向影响,但是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如果将4类传统媒介视为一个整体,那么传统媒介使用的积极影响则是相当显著的——表明传统媒介接触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似乎是潜移默化式的。与中央电视台占主导地位的中央媒体格局不同,不同类型的传统媒介

表1 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 Ordered Probit 回归模型

变量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传统媒介使用	0.031* (0.019)		0.050*** (0.019)	
新媒体使用		-0.082**** (0.014)		-0.041*** (0.014)
报纸		-0.007 (0.014)		0.007 (0.014)
杂志		0.028 (0.016)		0.022 (0.016)
广播		-0.011 (0.011)		0.012 (0.011)
电视		0.034*** (0.013)		0.007 (0.013)
互联网		-0.055*** (0.012)		-0.031*** (0.012)
手机		-0.025** (0.012)		-0.011 (0.012)
Log likelihood	-11 778.09	-11 772.68	-12 530.65	-12 529.7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p<0.001$ 、 $p<0.01$ 、 $p<0.05$ 、 $p<0.1$ 。

表2 传统媒介与新媒体 Ordered Probit 回归系数差异性检验

变量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传统媒介	0.031	0.050
新媒体	-0.082	-0.041
F值	5.323**	0.192

注:差异性检验使用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基于Wald Test得出;**表示 $p<0.05$ 。

在不同地区间的受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公众媒介关注度的分散导致特定类型的传统媒介使用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显著性。

新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有着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传统媒介上的环境信息内容过于单一,有关政府环境治理政策以及治理成果的报道无法满足公众对于多元化环境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在环境问题上,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是十分有限的^[36],这导致对于来自政府主导的传统媒介的环境信息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37]。传统媒介无法提供内容丰富且真实可信的环境信息,新媒介就成为满足公众这些需求的替代选择^[38-39];传统媒介将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成绩展现给公众,新媒介更多关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缺失与不足——导致新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

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网络群体事件并进一步导致现实抗议运动的重要诱因之一^[40]。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在环境群体事件的酝酿、发展和爆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会促使公众在新媒介上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做出负面评价,这一过程不断重复,便会进入“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不满—环境群体事件—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更加不满—更多的环境群体事件”这一恶性循环。

就具体类型的新媒介而言,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互联网使用都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有着显著消极影响,对于中央政府的消极影响要稍高于地方政府(表现为显著性上的差距)。作为新兴的移动传播载体,手机也与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媒介,其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对于政府认同所产生的效应受到具体信息内容和政府应对方式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环境治理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被认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提供一个可持续的交互性政策参与平台^[41],从而有助于提升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就研究结果来看,尚没有发现新媒介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的有力证据,但新媒介在环境治理公民参与方面的潜力为改进环境治理工作,寻求消除新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指明了改进的方向。

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的影响效力要高于传统媒介。新媒介在塑造政府形象与环境治理绩效满意度方面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当然,不应过度解读新媒介的消极影响。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影响效力的差距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表现出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新媒介使用会对公众的政府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新媒介对国家权威形成了挑战,其消极影响不应被夸大^{[30]90-103}。新媒介在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为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改进带来了机遇:沟通、谅解与建立互信是政府与公众共同应对环境问题时的必修课^[42]。

在环境治理领域,政府应当积极探索如何调整“政府—媒介—公众”的三边关系。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传统媒介在议题构建上应当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43],另一方面,政府应着手采取措施扭转新媒介平台上有关环境议题的负面舆论环境。

第一,应当建立新媒介平台环境问题公众意见搜集与数据挖掘系统。公众在新媒介平台上发表的有关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意见不应简单地被视为负面舆情而被“公关”^[44],应分析新媒介平台上公众对于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与反馈,并以此为参考对相关环境政策进行评估与调整,从而保证环境治理工作能够切实的解决公众热切关注的环境问题与难题。

第二,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环境热点事件(或称为环境运动)制定解决方案。发生于新媒介平台的环境热点事件通常会“坏事传千里”,地方性偶发事件甚至会带来恶劣的全国性影响。应在制度设计和技术实现上为运动参与者和政府间的双向沟通提供制度保障与平台接口。应当在微博、微信等主流新媒介平台部署信息接入通道(例如在微博开设“环境意见直通车”官方微博),并设置专人管理与维护。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 近年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 年均递增 29%[EB/OL]. (2012-10-27)[2016-02-12]. <http://js.people.com.cn/html/2012/10/27/176751.html>.
- [2] LIU L, ZHANG B, BI J. Reforming china's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11th five-year pla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2, 21(1): 106-111.
- [3] 于文超, 高楠, 龚强. 公众诉求, 官员激励与地区环境治理[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5): 23-34.

- [4] XENOS M, VROMEN A, LOADER B. The great equalizer? patterns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youth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ree advanced democracie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4, 17(2): 151-167.
- [5] 中国新闻网. 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理念重大意义[EB/OL]. (2016-04-10)[2016-04-12].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4-10/7828889.shtml>.
- [6] 张凤凉, 郑方辉. 政府绩效视野下的生态环境满意度实证研究——以2007年广东省为例[J]. *太平洋学报*, 2009(4): 73-79.
- [7] 宋国君, 宋书灵, 罗兰, 等. 城市环境保护满意度及案例分析[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9(2): 81-86.
- [8] 孙玉红, 何勃夫. 环境保护工作公众满意度模型(epsi)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科技创新导报*, 2010(24): 134-196.
- [9] 袁文华. 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度及案例分析[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5(12): 191.
- [10] ZHAO X. Personal values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hina and the u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al media use[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2, 79(2): 137-159.
- [11] HOWARTH, A. Participatory politics,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and newspaper campaigns[J]. *Journalism Studies*, 2012, 13(2): 210-225.
- [12] LESTER L, HUTCHINS B. The power of the unsee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the media and invisibility[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2, 34(7): 847-863.
- [13] MERRY M K. Blogging and environmental advocacy: a new way to engage the public? [J].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10, 27(5): 641-656.
- [14] O'KEEFE G J. Political malaise and reliance on media[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80, 57(1): 122-28.
- [15] MUTZ D C, REEVES B. The new videomalaise: effects of televised incivility on political trus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 99(1): 1-15.
- [16]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1): 65-78.
- [17] NORRIS P, CURTICE J.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a two-step model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campaign communication flows during the 2005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2008, 4(4): 3-13.
- [18] NORRIS P.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 Pluralism, participation and party websites[J]. *Party Politics*, 2003, 9(1): 21-45.
- [19] AARTS K, SEMETKO H A. The divided electorate: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Politics*, 2003, 65(3): 759-784.
- [20] BOULIANNE S. Does internet use affect engagement?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09, 26(2): 193-211.
- [21] HILBERT M. The maturing concept of e-democracy: from e-voting and online consultations to democratic value out of jumbled online chatter[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2009, 6(2): 87-110.
- [22] STOYCHEFF E, NISBET E C. What's the bandwidth for democracy? deconstructing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citizen attitudes about governance[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4, 31(4): 628-646.
- [23] TOLBERT C J, MOSSBERGER K. 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3): 354-369.
- [24] WILLIAMS B A, DELLI CARPINI M X. Monica and bill all the time and everywhere: the collapse of gatekeeping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4, 47(9): 1208-1230.
- [25] BUNS A. Gatewatching, not gatekeep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J].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2003, 107(1): 31-44.
- [26] KAUFHOLD K, VALENZUELA S, DE Z.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user-generated news use rela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0, 87(3-4): 515-529.
- [27] AVERY J M. Videomalaise or virtuous circl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 media on political trust[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9, 14(4): 410-433.
- [28] IM T, CHO W, PORUMBESCU G, PARK J. Internet,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itizen compli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4, 24(3): 741-763.
- [29] 高学德, 翟学伟. 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J]. *社会学研究*, 2013(2): 1-23.
- [30] 张明新, 刘伟.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1): 90-103.
- [31] 胡荣. 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J]. *社会学研究*, 2015(1): 76-96.
- [32] 王利涛. 从政府主导到公共性重建——中国环境新闻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 76-81.
- [33] 林晖. 媒体多元条件下的多元新闻框架——以企业报道等为例[J]. *新闻记者*, 2007(4): 18-22.
- [34] 黄河, 刘琳琳. 论传统主流媒体对环境议题的建构——以《人民日报》2003年至2012年的环境报道为例[J]. *新闻与传播*

- 研究,2014(10):53-65.
- [35] NEWTON K. Mass media effects:mobilization or media malaise?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9,29(4):577-599.
- [36] ZAVESTOSKI S,SHULMAN S,SCHLOSBERG D.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internet:electronic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regulatory rulemaking[J].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06,31(4):383-408.
- [37] YANG K,HOLZER M. The performance-trust link: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 measur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1):114-126.
- [38] LEE C S,MA L. News sharing in social media:the effect of gratifications and prior experienc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2,28(2):331-339.
- [39] GIL DE Z,IGA H,JUNG N,VALENZUELA S.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social capital,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2,17(3):319-336.
- [40] 荣婷,谢耘耕.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传播与应对——基于2003—2014年150起中国重大环境群体事件的实证分析[J]. *新闻记者*,2015(6):72-79.
- [41] MARTIN N,RICE J. Rebalancing climate change debate and policy:an analysis of online discussions[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2014,24(5):338-350.
- [42] ZHANG L,MOL A P,HE G. Transparency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16,18(1):17-24.
- [43] 黄河,刘琳琳. 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4(1):90-102.
- [44] 马得勇,孙梦欣. 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 [J]. *公共管理学报*,2014(1):104-113.
- [45] SOMA K,MACDONALD B,TERMEER C,OPDAM P. Introduction article:informational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16,18(1):131-139.

How Does Media Use Affect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a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

ZHOU Quan, TANG Shukun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ttract increasingly attentions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CGSS2013) data, comparative analysis how do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ffect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a using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all other variables, the traditional media (newspapers, magazines, radio, televi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a, while the new media (Internet and mobil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ea, a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levels. Moreover,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he new media show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public opinion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an the traditional media. After a in-depth discuss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advices for public policy reformation are proposed.

Key words: media u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箫姚]